



红氍毹上华夏情

——读《戏台上的中国》



胡胜盼/文

如果把品书比喻成品茶,那每本书都有自己独特的滋味。普洱茶,无论是生茶还是熟茶,都有茶气足、回甘生津持久、醇厚饱满等特点。品读作家张石山、王芳合著的对话录《戏台上的中国》,解悟两位作者对戏曲的痴心,亦如品味普洱之甘醇,闻之于鼻尖,而萦绕于心头,令人动情。

张石山,曾任《山西文学》主编,山西省作协副主席。王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黄河》杂志编辑,《映像》杂志副主编。两位作者除了拥有“作家”这一共有身份外,他们还都是铁杆戏迷。因此,两位作家以戏迷的眼光来一起对话中国戏曲,探究中国戏曲背后深厚的人文底蕴,便有了有趣的《戏台上的中国》。对话录的形式不算新颖,但很有意思。读者没有翻开书的时候,只有两位作者在倾心“私聊”,但当读者把目光投注于此书的时候,就会发现,慢慢地,“私聊”变成了“群聊”。于是乎,共鸣、共情、共识也就随之而来了。就像泡开的一壶茶,泡着

泡着,味道越来越浓,喝着喝着,心境越来越广了。

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台上台下,戏里戏外究竟有什么魅力能让中国人如此着迷?据说是因这其中蕴含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基因和文化血脉,而戏台正是中华文明脉络延伸的一支。不过,《戏台上的中国》针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回答得那么玄妙。该书第一章“我们从小爱看戏”以童年回忆的方式,回应了中国人为何爱看戏。如果说乡愁是一种精神印记,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喜爱戏曲多半也来源于此。王芳回忆儿时随父亲一起去看戏、唱戏,乃至趴在戏箱上熟睡,被散戏后的父亲拎着回家。若干年过去,自家门前的老戏台已被拆掉,明月下,院子里空荡荡的,王芳的心也若有所失、无所寄托。或许,这就是中国戏曲为什么绵延了八百多年,即便是盛而衰,却依然生生不息的缘由。就像张石山所说:“如果初尝美食,得到的是味蕾的记忆,那么,最早看戏,得到的就是听觉和视觉的原始审美记忆。”是啊,这种原始审美记忆并没有从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中消失,只要在月明之夜轻轻呼唤,我们的性格基因也就随之复活了。

中国戏曲作为一种写意的舞台艺术,其本身就承载着中国人的生命哲学,直接反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它曾经极大地影响乃至主宰了中国人的道德人格与审美格局的养成。本书第七章“戏剧和文学的关系”以及第八章“戏剧与生活的互动”,就戏剧与文学、生活的关系作了细致的讨论。正如书中所说:“当然,古来的文学大家,包括那些籍籍无名的乡野人士,大家编撰戏文,天然地或者是有意地秉持了一个‘寓教于乐’的原则。”戏台上传统戏也好,

新编剧也罢,它们写的虽是古人事,但实际上都是现实生活直接或间接的写照。公平、正义、忠贞、仁爱的审美文化得以被追求和表达。戏曲高台教化的使命就这样在戏台上传承了数百年。当然,除了达到教化的目的,还有娱乐的性质。著名学者钱穆认为,中国戏曲深得“游戏三昧”,“中国人对人生太认真,故而有戏剧教人放松,教人解脱。”于是,戏曲也成为一切民俗艺术的载体,渗透到民间生活的细枝末节,成为世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戏台上的中国》第三章“脸谱与行当”、第四章“戏曲程式诗意美”及第五章“炫目绝技功夫深”是针对中国戏曲的表演特色、审美体系和创作原则进行对话的。从书中看张石山和王芳对戏曲艺术的如数家珍,读者感受到的是他们对戏曲发自心底的爱。值得一提的是,王芳虽然是一名文学刊物编辑,但从未停止对戏曲作系统性的梳理和研究。她曾说,自己进行戏曲研究,目的是破解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戏剧流传千年的秘密,就是中华民族存在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区别于其他种族的秘密。有了它,中国审美、中国意象、中国情怀都在,没了它,世界一片荒凉。”如果不是捧出一颗炽热之心,如果不是对戏曲爱得深沉,如果不是对中国文化理解得那样透彻,她是不会这样不畏风霜,痴心不改的。

“戏剧源流脉络清”和“中国戏剧前景展望”分别是本书的第六章和最后一章。两章对话,似乎可以形成呼应。中国戏曲一路走来,起起伏伏,但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人的生活。读《戏台上的中国》,追踪其源流、触碰其筋骨、探索其精神,中华文脉在戏台上延伸的轨迹也显得越发清晰。

大漠敦煌遗韵

——读《敦煌大历史》

胡燃燃/文

《敦煌大历史》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历史通俗读物,书中以时间线为主轴,分为多个章节,详细描绘了敦煌的历史变迁,其中对石窟艺术的讲解尤为深入,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辉煌的艺术殿宇。

敦煌是一个由移居者建立的城市,早期的移居者是来自长江流域的三苗人。考古发现表明,四千年前的敦煌环境与江汉平原相似,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三苗人长期稳定地生活在这里提供了保障。汉武帝击退匈奴后,在敦煌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张骞出使西域,不仅为中原带来了良马和葡萄,更重要的是,打开了中原与西域的商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门,促成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对敦煌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启,敦煌成为佛教传播的重要枢纽。为了让百姓能够通过佛像和壁画理解佛教,大量石窟在此被雕凿而成,积累了

丰富的艺术文化作品。作者邢耀龙认为,敦煌艺术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在早期,佛像和壁画深受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但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这些艺术作品逐渐融入了中原的绘画风格和审美观念。后来,吐蕃占领敦煌,藏传佛教艺术对敦煌石窟的空间布局、艺术风格、绘画内容和信仰主题等进行了重构,使敦煌石窟艺术更加多元化。而在西夏和元时期,民族艺术与宋代绘画相结合,围绕玄奘取经进行创作,通过文化交流与互动,各民族逐渐汇聚成一个共同的文化体。后期在明清时期,由于封闭,这一发展中断。尽管如此,敦煌艺术在大众审美的追求中不断创新,历经千年,仍然独树一帜。

敦煌被誉为佛教艺术的圣域,拥有众多文化瑰宝,石窟更是凝聚了千年的艺术精华。邢耀龙通过娴熟的笔触,将读者带回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讲述了一代代守窟人用生命与热爱守护这些珍贵石窟的故事,使敦煌文化在历史风雨中得以保存。其中,郭道长守护榆林窟的

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面对匪徒的酷刑拷打,即便濒临死亡,也坚守着师长“不到太平盛世,不可让象牙佛现身”的嘱托。后来,他对路过的红军西路军慷慨解囊,冒着生命危险援助了困境中的红军战士。新中国成立后,郭道长将秘藏宝物象牙佛上交给国家,使得这件精美绝伦的文物得以重见天日。如今,象牙佛作为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一直被保存在国家博物馆的文物库房中。

阅读《敦煌大历史》时,我仿佛跟随作者穿过了时光长河,眼前浮现出一个个关于敦煌的生动画面。而与敦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共同塑造了敦煌的血肉,流淌着泪水与愁思,燃烧着不屈与传承的火花。这本书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历史、理解文化、启迪智慧的窗口,让我明白,敦煌学不仅是一门关于历史的学问,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期待有更多学者和年轻人投入到敦煌的研究和保护中,让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永远熠熠生辉。

寻找心灵的共鸣

——读《人间信》

陈光荣/文

当我怀着期待与好奇翻开麦家的《人间信》,犹如一头扎进了一个深邃而温暖的心灵世界,一场与自我、与世界的深度对话就此拉开帷幕。

麦家,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他是当代著名小说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人间信》是麦家今年出版的力作,是一部具有丰富内涵的人生“教科书”。

这本书里的文字,像是麦家亲手为我点亮的一盏盏明灯,不仅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更穿透了我内心深处的迷雾。我读着那些细腻且真挚的篇章,仿佛不是在阅读,而是在亲身经历一场灵魂的洗礼。

麦家说:“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当我读到这句话时,内心犹如被重锤击中。在过往的岁月里,我总是在忙碌中

匆匆前行,错过了太多生活中的细微美好。而此刻,我开始反思,自己记住的那些日子,是否真的是生活的真谛?我意识到,只有用心去感受、去铭记那些温暖的瞬间,生活才会在记忆中绽放出绚烂的色彩。

书中对于亲情的描绘,更是深深触动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麦家写到:“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这句话让我热泪盈眶,思绪瞬间被拉回到与父母相伴的那些平凡而又无比珍贵的时光。我想起小时候父母温暖的怀抱,想起他们为我遮风挡雨的身影,那些曾经被我视为理所当然的关爱,如今都成为我生命中最璀璨的宝石。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亲情的无价,也更加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每一刻。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人间信》无疑是一位睿智的“导师”。麦家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句话让我在面对挫折和迷茫时,有了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它让我明白,人生本就

是一场充满艰辛的旅程,每个人都会遭遇困境,但正是这些挫折,塑造了我们的性格,让我们变得更加坚韧和成熟。每当我感到彷徨无助的时候,我都会翻开这本书,从其中汲取力量,继续前行。

在阅读《人间信》的过程中,我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我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态度,更加懂得珍惜身边的人,珍惜那些稍纵即逝的美好瞬间。我也变得更加勇敢,敢于去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梦想,不再畏惧困难和失败。同时,我也学会了以更加坦然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将挫折视为成长的阶梯。

我深信,每一个沉浸在《人间信》中的读者,都会如同我一般,在字里行间找到那份独属于自己的感动和力量。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位伴随我们走过风雨的挚友,让我们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始终能够坚守内心宁静与温暖,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觥筹交错掩映下的礼仪秩序

——读《酒里乾坤:宋代宴会与饮食文化》

禾刀/文

宋代历史上曾有一次壮观的宴饮盛会。宋神宗熙宁二年,朝廷制订了一份集英殿大宴的人宴人数表单,统计数据显示,能够参与宴会的人员达到1300余人。1300余人并不全是赴宴的文武百官。宴会是一种群体性的饮食活动,宴会过程中所展示的食品、器物、酒饮、乐舞、游戏、礼仪、习俗等,集中呈现了社会阶段性的物质发展水平与文化风貌,是观察社会发展状况的显微镜。本书从官方和民间两个视角考察了宋代具有代表性的宴会活动,情景式再现了宋人的饮食生活日常。

关于宋代宴饮,无论是宋徽宗赵佶亲自操刀的《文会图》,还是北宋宣和画院待诏苏汉臣的《开泰图》,抑或南宋画家马远的《华灯侍宴图》等画作,均为真实反映当时宴饮热闹场景的生动“写生”。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将北宋酒席宴饮文化延伸至市井街头,画中酒肆林立,食客熙熙攘攘。在1999年5月发现的河南林州北宋宋砖雕壁画墓中,墓壁上有一幅夫妇宴饮图,真实再现了宫廷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状态。如此说来,宋代宴饮文化之兴盛,早已成为社会上下的普遍共识。

众所周知,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留下“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典故。在这场特殊的宴饮活动中,宋太祖以一种“艺术”的方式,轻松化解了他对手握重兵的开国功臣群体的焦虑,构建了全新的君臣秩序。而在本书作者看来,宋代确立宴饮的特殊地位,“是五代以来朝堂礼崩乐坏之后,北宋政权在建立之际,为了树立起重建大一统国家礼制的坚定决心而做出的政治姿态;另外,考虑到宴饮活动本身的特殊属性,凸显宋代国家‘宴以示恩惠’的基本理念。”宴饮一方面增加了朝廷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宣示皇恩浩荡,借此拉拢人心。

宋代宫廷宴饮的秩序表现为官阶大小的座次之别及饮酒顺序,更表现在器具的差异上。“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朝廷就明确规定,凡是器用,禁止表里涂抹朱漆、金漆,不允许以红色为底衬。非三品以上官员、宗室、皇帝国戚,禁止使用金棱器。使用银器,则禁止涂抹成金色。玳瑁酒食器具,非皇宫大内一律禁止使用。纯金器具,只有被皇帝赏赐者方可使用。”这一点与欧洲皇室大多喜欢用贵重金属银制餐具、摆件有异曲同工之妙,越是贵重越能折射出身份的尊贵。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在远离宫廷的普通社会,同样存在许多宴饮,而最雅致的则是文人的宴饮。众所周知,宋代诗词文化是中华历史上的又一高峰,涌现出大批以诗词闻名后世的文人。宋代文人写诗作赋,有时源自宴饮场合的诗词游戏,有时则来自于宴饮与山水结合后的诗情流露。如苏轼的《赤壁赋》有言“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

宴饮礼仪风气的兴盛,刺激了宴饮文化的飞速发展。南宋国力虽不及北宋,但在宴饮方面一点都不含糊。“南宋时期,临安城里有专门负责提供公私各类宴会服务的商业组织——四司六局”,分工日益详细繁杂。同时,人们对食材的要求开始从味觉转向视觉,“对食材进行雕刻装饰”日成风气,有的雕刻仅仅“为席而上的看菜”,极尽奢侈。此外,宴饮文化还大大刺激了“用于宾宴遣兴的杂剧表演”的发展。目睹南宋朝廷歌舞升平的诗人林升,曾在诗中发出灵魂叩问:“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宋朝国力繁庶强大,但也并没有想象中那般美好。开头所叙宋神宗熙宁二年举办大宴的这年,王安石走马上任参知政事,次年便推出均输法、青苗法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通过改革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实际是为了解决日益枯竭的财政危机。宋代宴饮毫无节制,必然造成巨大财政压力。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在众多原因中,肯定少不了一些人对宴饮陈规陋习的顽固坚守。

